◆杂　谈

“权力至上”意识之泥潭

权力至上的意识，渗透于人性的深处。权力，让人既惧怕而又仰慕，既躲避而又追逐，既不无谴责，又打心里赞许和崇尚，并时刻准备为获取它而作出牺牲。

一部《史记》，乃至二十四史，上演了一个个追逐权力的故事：父子兄弟相互残杀，为消灭异己生灵涂炭。权力意识又根植于封建时代的农民，他们崇尚皇权，认为谁拥有了权力就可以号令天下，只知生存本身就是支配、限制、占有，及被支配、被限制、被占有。于是，封建时代的一场场农民革命，总是遭遇相同的命运，草草收场。即使到了今天，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氛围依然有待强化，专横的权力运作仍屡屡发生，许多孩子的抱负依然和“当大官”“衣锦还乡”或“出人头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好权者、跑官者，源于对“公仆”的曲解。社会既要有分工，便不可无官，官本是为公众服务之人，即公仆。真正甘愿仆于公众者，若人人争相竞之，实乃世之大德也。然而，人们争相获取的却是权力寻租所带来的滚滚钱财、巨大荣耀，以及种种特权。于是，“公仆”之要义，人的道德、尊严、价值早早被抛到了脑后。权力与财富、荣耀，成为等值的概念，所以大有殚精竭虑不择手段获之者，将晋擢一级半阶视作性命攸关者。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历史最根本的源头，不应该简单地求之于社会制度、物质生产，还应更进一步向人心或人性深处去探究。他分析人类多种天性本能，诸如竞争、虚荣、侵略等，由此简约为三——占有欲、权力欲、创造欲，并说“社会科学中基本的概念是权力”，“社会动力的法则，唯有用各种形式的权力的用语可以表达出来”。

不可否认，对权力的追求，在客观上于社会发展的确是一种动力，恰如恩格斯把它称为人类步向文明所借用的那根“恶的杠杆”。回眸那根“杠杆”，泛希腊时代的辽阔疆域，来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攻略，古罗马军团赢得了一个统一的地中海，但是其军团方阵所到之处又无不化作焦土和血泪。尼罗河上那位美丽的克里奥帕特拉，先爱上恺撒，后妻于安东尼，但她并不是嫁给一个个男人，而是将躯体出卖给了“权力”，末了自杀。着眼近处，当下多少官员深陷于权力的崇拜，意志凌驾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上，导致权力滥用，最终身陷囹圄，玩火自焚。（2015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邵振国）

◆观　点

亟需清晰界定“城乡”概念

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如果这两个概念不清楚，何以谈城乡关系？如果对这两个概念只有模糊的把握，又何以保证涉及城乡关系的政策的指向性？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些问题，似乎可以认为这些问题不存在；而一旦提出这些问题，会感到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城乡界定的混乱，将直接引起政策指向的模糊。目前，我国一系列涉农政策与城乡界定有关；城乡界定不科学，会给涉农政策的运行带来麻烦。确定城乡界限，给出一个区分城市与乡村的量化标准，对理顺城乡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城乡发展政策有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口密度及其经济活动总量不同，各种排放的自然净化的社会成本不同。低于一定密度的人群所产生的排放可能不需要做工程化处理。

二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发展的权利平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居民点因为被看作乡村，公共财政可能不会去承担必要的责任，而不得不依靠诸如“一事一议”的办法解决公共投资问题。相反地，一些真正的乡村地区，因为居民与政府的关系特殊，例如居民点被列为某某示范区，就可能得到超出需要的财政投入资金，形成公共品的过度供给。这种情形在调查中相当多见。一些农业区不适当地修筑较宽的铺装道路，不是根据实际常住农业人口安排公共设施建设，过早助推我们这样一个还不发达的国家出现明显的“逆城市化”现象，使一些本来的农区居民点成为城市人口的第二居住地。从宏观格局看，这种情形产生了土地的低效率利用。

三是有利于形成促进城市体系均衡发展的政策。一些较大的居民地实际上已经是小城市，只是因为在政策上被看作农村，没有被纳入城市体系去考虑政策调整，严重影响其发展空间。这种小城市未能成为大型产业项目的落脚地，大型产业项目均被集中于省市级各类开发区，使小城市成为依附上级政府财政转移的低水平的寄生型经济体，产生一系列社会病。

四是有利于建立规范的国家科层管理体制，形成合理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目前，在我国地方政府序列中增设一个“市”，通常要通过“县改市”实现，需要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这种审批权力包含一定裁量自由，权力行使不规范。一些区域的建制镇经济规模超过了上级政府所在住所的经济规模，镇领导人行政级别被置于上级政府主管局长之上，使上级政府职能部门难于行使权力，徒增政府治理能力的羁绊。（2015年11月16日《北京日报》党国英）

环境第三方治理应在试点中提速

环境污染状况恶化，治理形势相当严峻。然而如何治理、怎么治理却面临着路径的选择。在国际上，工业减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即排污企业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生的污染交由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集中体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此举可以提高治理的效率，由分散向集中转变，避免企业治理的各自为战，可以将有限的环保资金集中起来，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此举可以让治理更加专业。专业产生效益与效率，专业的环保企业在技术、设备运管、问题应对处理能力方面，要比排污企业具备明显优势。第三方治理因为更具专业能力与素养，从项目的规划到实施过程中，都能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在效果上也能更加集约而明显，符合社会分工细化的要求与趋势。

再次，此举可以建立明晰的责权利关系。有了第三方的参与之后，企业可以把产生的污染交给专业公司来治理，而政府也可以只对专业公司进行集中化监管，有助于降低执法成本。同时，实行第三方治理模式之后，意味着专业公司将接受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双重监督，在绩效上也要接受专业的审查，在治污效率、运行成本、责任约定方面更清晰，产生的综合效益更加可观。

此外，市场化、专业化的治理要求，也需要通过第三方参与的模式来实现破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然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升级，面临着几个重要并待解的难题。比如“如何治理”的方式探索，“谁来治理”的供需矛盾。作为有别于行政强力治理和企业自我治理的新型治理方式，第三方治理要达到预期目的并不容易。一是政府机构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发挥好政策导向与服务引导作用，并由此为第三方治理创造条件和预留空间。二是企业如何积极参与，其成本又如何核算，第三方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又如何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三是第三方公司的供需矛盾如何解决，若没有成熟而完备的第三方市场体系，那么第三方治理只能成为空话。

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化主导治理模式，使得第三方市场的发育并不成熟，专业化的治污企业还非常稀缺，供需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同时，第三方治理的过程中，责权利如何分摊，成本如何分解，利益如何分配，都需要明确相应的界限，探索一条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机制。基于此，将其由理论上升到实践，并通过试点成功之后加以推广，不失为转变观念、培育市场和优化机制的现实路径。

不过，相比于预期中的蓝图，第三方治理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最终“落地”，尚需面对企业信用、环保监管等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上海作为全国第三方治理尝试较早的地方，“十年磨一剑”之后才悄然提速，其难度之大过程之长可见一斑，由此不难想象其他地方面临的困难。不可否认，基于外部条件和环境因素，第三方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究竟是等条件成熟了再实施，还是在实施过程中创造条件，需要治理主体对环境的危险性、治理的严峻性有更清晰的判断，同时取决于其是否有更成熟的市场视野。若非如此，第三方治理的前景难言乐观。（2015年12月3日《法制日报》唐伟）

◆评　论

供给侧改革提升经济质量

近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一词，令人耳目一新，若想对此有正确的了解，还需对“需求管理”一词有所探讨。

“需求管理”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认为，任凭市场自由调节是无法实现经济自动均衡和充分就业状态的，当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存在闲置资源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性货币政策，增加财政开支，如增加公共工程投资、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扩张需求，促进经济的复苏。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但随后于二十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通胀（“滞胀”）沉重地打击了这一理论，出现了与需求管理相反的重视供给管理的学派——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方的重要性，主张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中，把供给放在首位，减少政府的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政府收入增加，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另外，供给学派特别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价值。供给学派认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越大，经济的发展就越迅速、繁荣，这种经济制度也就越有生命力；反之，这个社会就趋于衰落灭亡。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表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是我们在经济困难时的优先选项。比如2008年为应对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们采取四万亿刺激政策，在为中国保就业稳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稳定贡献了力量。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三期叠加效应愈加显著，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呈现疲弱状态，中国经济处于艰难转型之中。国际经济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并不是投资推进了增长，反而是增长拉动了投资。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现状，当下正是我们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加以重新思考的时候。

由于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自然环境和资源约束已经到了可承受的极限，中国经济不转型已难以为继。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变化、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动力转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特别是欧洲政治经济形势在恐怖主义分子对巴黎血腥袭击后存在的巨大变数和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尚不得而知。而投资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城镇化以及海绵城市、城市地下管廊、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型投资项目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加上对一些传统投资项目如高速铁路的跟进，投资的基本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贡献也是可以期待的。

而此时如果能够采取供给侧管理，扩大内需在不远的未来将不仅仅再是一个口号。据统计，2014年我国居民赴境外消费达一万亿元，从境外大包小包背着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回国已成为世界一大奇观。为什么要从国外买这些充斥于国内的高压锅、电饭煲甚至马桶盖一类的商品呢？除质量原因外，“供需错配”是根本原因。尽管李克强总理已经表态说不会限制国人出境购物消费，但如果把在境外的消费支出放在国内，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将不可小觑，拉动内需也会真正落地。

要想把消费留在国内，实现习近平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要求，就必须借鉴供给学派理论抓紧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法治建设，打造良好政治和经济生态，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率，生产出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二是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是大规模减税。上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供给学派的旗手阿瑟·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指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三是调整消化产能和库存，改善供给侧结构，扭转“供需错配”的窘境。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投资、出口、消费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下，我们更需要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动力”来提升经济质量，而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出发点。（2015年第44期《中国新闻周刊》杨英杰）

◆文　坛

管仲：逆袭天下的经济学家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被孔子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甚至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

早先，他和鲍叔牙分侍齐僖公的两个儿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襄公驾崩后，小白成功即位，即为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不但原谅了管仲的一箭之仇，还用计把他从鲁庄公的手中赚了出来，拜为丞相。

据说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管仲为齐相后，其在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使人怀疑他根本就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穿越回春秋时代。我们来看看他的几个足以载入商学院教材的经典案例。

衡山国夹在齐鲁之间，国民擅长制造一种很厉害的攻城机，堪称“春秋原子弹”，齐桓公想搞定他们又怕干不过人家，就让管仲想办法。管仲发现衡山国制造一台攻城机要一年半的时间，于是他不计价格，以高价进口这种机器，还煞有介事地付了丰厚的定金。

燕国、秦国等老牌强国一看急了，齐国这是在扩充军备，争当世界老大的节奏啊。好，你买我也买。眼看订单滚滚而来，衡山国乐开了花，全民一窝蜂地开始制造攻城机，连衡山王自己都私掏腰包，暗地里进行了投资，上行下效，大家都去赚快钱，自然就没人去进行基础农业建设。慢慢地，田园开始荒芜，可狂热的人们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

这时，管仲又悄悄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由外交通商大臣隰朋领头，以3倍的市价在衡山国周边的国家收购粮食，5个月后，随着大量的粮食被运到齐国囤积起来，粮食的市价被炒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

眼看农时已过，齐国突然对外释放了“和平”的信号，宁肯将丰厚的定金赔给了衡山国，也要取消全部攻城机的订单。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马上产生，燕国、秦国也纷纷取消了订单。衡山国一看傻了，既没有赚到钱，又错过了今年的农时，结果发现粮食已经被炒到了天价。于是，衡山国爆发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不攻而破，成了齐国的附庸。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衡山之谋”。

在管仲为政40年的历史中，他又用极为相似的手腕，高价采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鲁国的丝绸。甚至他和齐桓公联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尊重当时已经衰弱的周王室正统，表面看来是政治阴谋，其实也是通过周王的权威，重新制定天下的经济标准，来达到为齐国谋取丰厚经济利益的目的。

所谓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管仲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谋的政客，甚至也称不上是个善于征战的军事家（历史上他带兵和弱小的孤竹国打仗，动不动就被敌人困在了沙漠里，靠老马带路才脱困，这就是成语“老马识途”的由来），但他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或企业家，他的一切治国纲要无不带着气息浓烈的商业标签，他把整个齐国当成了一个巨无霸的托拉斯企业。

可以这样说，当时的齐国其实就是一家央企，被管仲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500强”之首；而管仲，就是这家央企最为出类拔萃的CEO。他带领着这家企业在周朝成功实现了上市套现，其商业气质和当时的封建社会乍然相撞，让整个天下的政客们都久久回不过神来。（2015年11月15日《经济日报》李咏瑾）

◆史海钩沉

雍正的吏治之道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西郊畅春园。

老皇帝康熙撒手人寰，四阿哥胤禛在“九门紧闭”的肃杀氛围中夺得皇位，这就是雍正皇帝。父皇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整饬，庙堂坊间的猜测需要澄清，而这一切，既离不开他的战略决策，更离不开官员们的具体落实。因此，管好官员成了雍正初政的关键步骤。

重用“才具之员”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言事，其中提到他的用人原则是“因事择人”，而非因人派事。这一主张得到雍正的肯定，还获得这样一句朱批：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在他看来，“可信任”是在“德”的方面对皇帝绝对忠诚。然而，只有忠诚却无法胜任官职，以及连忠诚和胜任都做不到的人，就不必抱期待了。比起“可信任”，雍正也看重“办事能力”：“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安分守己固然是皇帝对大臣做人底线的基本要求，但如果安分到庸碌的地步，凡事唯皇帝马首是瞻，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与养闲人何异？

雍正极为看重办事实力，其来有自。夺位之说自其继位伊始便在坊间流传，时时威胁着他的正统地位。雍正清理政敌、扫除异己，都与这件事的纠结有关。财政亏空、陋规泛滥、吏治腐败、战事不利，雍正接管的是一个糟糕局面，哪像个盛世的样子？

正因如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面对每一天，用勤奋来扭转乾坤。看奏折是他一天的主要工作，一天批五六十份，每份都要批上几十字、几百字。一天的书写量不下万字。工作到后半夜也乐此不疲。雍正用自己的勤政，给官员们树立了严于律己的榜样。

皇帝爱批奏折，官员们落实朱批精神的工作量就异常庞大，对办事效率的要求也在提高。

汉族大臣张廷玉便是雍正欣赏的“才具之员”。雍正传达口谕时，只有张廷玉记得最准，且在短时间内形成文字。军情紧急之时，雍正口传圣旨，张廷玉随即写成文字，经雍正稍加修改，便发往前线。

正风肃纪刚猛务实

“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

对于康熙后期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雍正有着切身感受。这使他在继位后对官员作风的整饬，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雍正不断地宣传自己治理官场作风的三大理念：反对朋党政治、反对沽名钓誉、主张刚猛务实。他认为，树朋党是“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扰乱朝廷视听，破坏君主集权，是“罔上行私”的表现，是不忠于君主的大罪。年羹尧、隆科多虽是雍正继位的大功臣，但他们迅速滑落，乃至身败名裂，就是犯了结党营私的官场大忌。

士大夫常讲的“名实兼收”，在雍正看来，“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官帽子和钱串子，一个都不放过。山西巡抚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两年贡银，一年完成”，成为雍正树立的清理财政亏空的模范。然而，这些政绩是建立在横征暴敛和克扣商家基础上的。真相大白后，雍正不顾各方求情，毅然将他处决。雍正认为，为了沽名钓誉而谎报政绩，是以葬送朝廷前程和民意支持为代价的，危害比贪银更甚。他要求大臣们“筹国是，济苍生”，要求学校要“实行”“文风”并重。

康熙后期宽仁的为政风格要不要继承？雍正给出的答案是：“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不拘泥于祖宗家法，要视实际情况定。雍正强调，继位之初“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所以，雍正朝必须为政刚猛。

只靠皇帝不断呼吁，当然不可能拔除当时官场腐败的病根。雍正还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官场弊病的改革措施。

实施耗羡归公和建立养廉银制度，大幅提高各级官员的薪水和办公费，刹住了乱收费、乱摊派的自发动力。开设会考府，主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审计和清理积欠行动，迫使地方官赔补府库亏空，确保地方财政稳定。创立奏折制度，用皇帝与重臣单线联系的方式，形成中央驾驭地方和政令畅通的链条，实现高级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改革措施延续百年，固化了澄清吏治的制度性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营造了不敢贪、不能贪的官场风气。雍正管教官员的招数，为改进官员作风、荡涤官场环境、落实改革措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接手大清江山之初，府库存银不足800万两，交棒乾隆之时已有数千万两，经济硬实力和政治软实力触底反弹，为乾隆完成大一统奠定了强大的国力基础。在雍正朝这个特定时期，雍正的“干部管理”是成功的。（2015年第11期《财经国家周刊》唐博）